

大陸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神話

● 傅 鏗

姜義華先生與余英時先生商榷的文章認為，百年來中國激進主義不是太強而是太弱，文化大革命的本質也不是激進化走到其全面反傳統的頂點，而是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的氾濫，並認為真正的激進主義致力於將中國從古代文明引向現代文明。由於大陸知識分子向來大都在價值取向上認同於激進主義，因而大都以為激進主義似乎總是代表進步的社會力量和先進的思想（所謂代表「社會化大生產」的力量和思想），並且能將中國社會帶向現代化和美好的未來，而保守主義則代表着落後和倒退。我認為這種看法極為典型地反映了大陸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激進主義的一種神話。

從柏克的理論來看文革

姜義華先生的文章，為了說明保守主義的傳統，劈頭便抬出了英國保

守主義開山祖師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並且引述了其《法國革命反思錄》(*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恕我譯作「反思錄」，因為我想我們對「文化大革命」也正迫切需要作類似的反思)一書的六大論題。這說明姜先生是充分熟悉柏克的著作和思想的，並且不言而喻地同意將柏克的思想視作保守傳統的典型代表。然而倘若我們用《法國革命反思錄》所闡釋的六大論題作為保守和激進的歷史尺度，來逐個地剖析一下中國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麼這場「革命」究竟是保守還是激進，結論恐怕就像青天白日一樣明白了。

首先，就尊重宗教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僅對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正統儒家思想作了最為惡毒的討伐，將「孔孟之道」批得「體無完膚」，而且還掃蕩了民間社會中的佛道信仰及其寺廟組織。其次，就侵犯個人權利而言，文革時期隨便抓人、審問人和迫

害人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沒收「牛鬼蛇神」的財產以及大規模的抄家，污辱人格的遊鬥，恐怕連柏克所痛斥的法國雅各賓黨人的革命恐怖都不能望其項背。再次，柏克主張不能以平等觀念破壞社會等級制度，而「文革」則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取消八級工資制。其四，至於確認私有制的神聖性，那對文革領導人來說，則更是西方社會的萬惡之源，因而就連農民的幾分自留地都要收回或限制。此外，柏克強調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可是中國建國以後在城鄉徹底消滅了私有財產制度，原有以同姓的家族為基礎的村社組織也受到破壞；至於同鄉會、同業公會和寺廟等民間組織，則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已被一掃而光了。如此徹底地破壞傳統社會組織和傳統思想文化的政策措施，怎麼還能同過去保持連續性呢？怎麼還可能使變革逐步進行而不打亂原有的正常秩序呢？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談到「文化大革命」，大都只是控訴他們所受到過的迫害，而卻忘記了當時他們所信奉的也是相當激進的反傳統的思想，更很少有人像巴金先生那樣深刻地反省自己在當時差不多真誠地接受了左派分子的那些激進思想。一生都崇拜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並一度信奉過無政府主義的巴金先生晚年在其《隨想錄》中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時期差一點也把「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當作新中國的希望」^①。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知識分子都普遍地讚賞法國大革命，特別是雅各賓主義驟風暴雨般的革命專政，因為這場革命體現了徹底的反封建精神（如消滅貴族制度和天主教會），同時認為英國的「光榮革命」則

是同封建勢力的一種妥協。

文革與法國唯理主義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同法國啟蒙學者唯理主義的浪漫政治幻覺所造成的危害，存在着諸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且不說法國革命試圖徹底消滅貴族制度，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地主資產階級如出一轍，而且雅各賓主義革命恐怖和中國文化大革命都是邊緣人專政，前者的社會基礎是法國的「無套褲漢」，而後者所依靠的則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從價值理想來看，法國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烏托邦救世主義精神那就更為相像了。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以此岸世界為目標的法國革命，其進行方式卻正好同以彼岸世界為目標的宗教革命完全一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則更加突出地強調「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在於解放全人類」，是指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精神上還沒有得到解放，還處在人剝削人和人壓迫人的制度之下，還有待於他們去解救，有待於他們輸出革命。由此反映出了一種極端狂熱的烏托邦救世主義心態。

更為重要的是，法國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舵手所遵循的都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種「終極目的倫理」(ethic of ultimate ends)或曰「意圖倫理」(ethic of intentions)。用林毓生先生對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天職」的譯述來說，「以『意圖倫理』的觀點從事政治的人，認為為了使世界變得永遠美好無缺，為了使一切不道德與不公正的手段都再沒有使用的可能，他有理由最後使用一次極不道德、極不公正的手段以達成這個偉大的目標」^②。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談到「文化大革命」，大都只是控訴他們所受到過的迫害，而卻忘記了當時他們所信奉的也是相當激進的反傳統的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舵手所遵循的是「意圖倫理」，認為為了使世界變得永遠美好無缺，為了使一切不道德與不公正的手段都再沒有使用的可能，他有理由最後使用一次極不道德、極不公正的手段以達成這個偉大的目標」。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談到「文化大革命」，大都只是控訴他們所受到過的逼害，很少人像巴金那樣深刻地反省自己當時的思想和言行。

因而同遵循「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的人恰好相反，堅持「意圖倫理」的人必然是站在激進主義一邊的。

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指出，現代意識形態化政治恰恰起源於法國大革命，起源於法國啟蒙學者所鼓吹的理性王國的理想。法國大革命廢除了傳統的天主教信仰，卻按照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關於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設想，設立了一種崇拜理性、平等和博愛的新宗教(曰最高主宰教)，並試圖培養出一種「新基督徒」。美國社會學家倪思貝

(Nisbet)說：「在法國大革命深入進行時，千年王國信仰表現得最為生動。」然而這種烏托邦救世主義所導致的卻是「救國委員會」(由十二人組成)和羅伯斯庇爾個人的「革命恐怖」。

激進主義與自由不能共存

思想上的激進主義往往成為自由的大敵，不僅是社會主義傳統的激進主義(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激進主義的產物)會造成瘋狂迫害知識分子，侵犯個人自由，消滅私有財產這類後

果，法國革命中的激進主義也迫害知識分子(吉倫特派大都是知識分子)，侵犯個人的自由權利和財產權制度。就是英國的邊沁(Bentham)式激進主義——邊沁倡導的全景控制(panopticom)原則成為現代官僚機器控制人的有效機器——和穆勒(J.S. Mill)式的激進自由主義，也對個人權利在法治之下不受侵犯的消極自由構成了威脅。

所以現代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A. Hayek)說，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關於自由理論的傳統，一種是經驗論的和非系統的，另一種是思辯的和唯理主義的。前者莫基於對各種傳統和風俗制度的解釋，這些傳統和制度是自發地成長起來的，而且人們對它們的理解也僅只是不完善的，這是英國的傳統。而後者則旨在建構一個烏托邦，屢試而從未成功過，這便是看似邏輯上合理的法國唯理主義的傳統，其基設是人性可以得到永無止境的改善，而且人類理性具有無限止的能力。海耶克認為，唯理主義的主張和方法在這裏幾乎完全違反自由的所有獨特成就，並將摧毀自由的價值。因為唯理主義者相信所有有用的制度都是偉大的立法者有意設計的產物，而不能想像任何服務於人類的目的，但又非人類有意識設計的事物。這種人差不多必然是自由的敵人，因為對他們來說，自由便意味着無法無天^③。所以，在柏克、托克維爾和海耶克這些帶有自由派傾向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看來，一個市民社會倘若失去了傳統的宗教和道德基礎，那麼公民的消極自由也將受到無可避免的威脅。

可是中國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所遵循的，恰恰大都是法國唯理主義者的傳統。他們像法國啟蒙學者一樣持

有激烈反宗教的無神論觀點，如果說還有差異的話，那麼中國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在無神論觀點上更加徹底而偏執(例如據唐德剛回憶，胡適之晚年嚴詞拒絕到教堂為朋友的女兒主持婚禮即是一例)；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科學主義取向也更加接近於作為科學主義源頭的法國唯理主義傳統，或者說不過是其現代發展而已；最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救世主義精神也同樣導致了現代史上各種激進主義思潮的盛行。由於遵行着這種唯理主義的傳統，加之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實質差異又實在太大，於是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宗教道德自然沒有好感，就像法國啟蒙學者將其視作「迷信」一樣。從而這些知識分子注定要失落他們所宗奉的自由。

唯理主義者相信所有有用的制度都是偉大的立法者有意設計的產物，不能想像任何服務於人類的目的，但又非人類有意識設計的事物。這種人差不多必然是自由的敵人，因為對他們來說，自由便意味着無法無天。

註釋

- ① 巴金：《隨想錄四十九·說真話》。
- ②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6)，頁379-80。
- ③ 參閱 F.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 54-55, p. 61.

傅 鏗 1959年生，1990年獲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現任職於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著有《西方文化理論導引》等，現從事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學研究。